

《张佩纶日记》与丰润张氏藏书考论

谢海林

内容摘要:张佩纶为晚清著名藏书家,其藏书来源的主要途径有受赠、购买、传抄等。光绪十九年十月购得仁和朱氏结一庐藏书185箱,藏书开始激增,有数万卷之多,辛亥革命前达到顶峰,多达5百餘箱。从《张佩纶日记》来看,张佩纶藏书的精华以抄本居多,还有部分宋元明清精刻旧槧和名帖拓本。藏书的目的一是为了娱情,二是为了治学。

关键词:张佩纶 《张佩纶日记》 结一庐

张佩纶不仅著述宏富,而且藏书颇丰,但在近代藏书家名单中却难得一觅,仅见郑伟章《文献家通考》著录,惜过于简略。关于张佩纶藏书的专题论文罕有人言,虽有个别论著对此有所涉及,或语焉不详,或讨理未精。徐雁平在探讨晚近江南书籍社会时说:“日记中所记录的书籍史料更具过程性和整体性,且能还原当时氛围和情状,故在书籍史的研究中,此类文献颇受重视。”^①日记等私密性较强的文献详细地记录了书籍流动、书估兜售、藏家收藏等动态情况。对于张氏日记所载的访书藏书等史料乏人问津,目前只查到邓之诚1949年9月21日日记有简短摘评,惜未作深论^②。笔者在整理《张佩纶日记》的过程中,发现不少与张氏藏书相关的史料,现拟就张佩纶藏书作一番探讨。

一、张佩纶藏书与结一庐藏书之关系再辨

张佩纶(1848-1903),字幼樵,号笈斋,室号涧于草堂。直隶丰润人(今河北唐山市丰润区)。同治十年(1871)进士,光绪八年(1882)升左副都御史。张佩纶是同光两朝清流“四谏”之一,也是一个藏书颇丰的收藏家。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六日日记载:“十年购书,间有精抄本。”^③《张佩纶日记》记录的时间是光

①徐雁平:《〈管庭芬日记〉与道咸两朝江南书籍社会》,《文献》2014年第6期,第74页。

②邓之诚著,邓瑞整理:《邓之诚文史札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2年,第483页。

③张佩纶著,谢海林整理:《张佩纶日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5年,第519页。下文所引张氏日记,皆出此整理本,如正文中已署日期,则不再一一注明页码。

绪四至六年、十一年至二十一年。由此前推后延,张佩纶的藏书时间起码有十余年之多。而学界论及张佩纶藏书的,皆从同光时期仁和朱氏结一庐藏书说起。因为张佩纶的第一任夫人朱班香(一作芷乡)乃结一庐主人朱学勤之女。似乎张佩纶藏书的来源与此脱不了干系,个中原委却大有再辨的必要。

结一庐藏书经过朱以升、子朱学勤(字修伯)、孙朱澂(字子清)朱潛(字子涵)三代人数十载的大肆搜罗,苦心经营,精本充牣,名甲江南。叶昌炽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称,光绪十六年(1890)朱澂病亡,“遗书八十柜,尽归张幼樵副宪”^①。各家对此解说纷纭。其一,结一庐藏书是否由此开始流散?其二,此时的结一庐藏书是否尽归张佩纶所有?

李雄飞说:“学勤死后,结一庐藏书基本是由其长子朱澂管理的,而次子朱潛则居京奉亲。澂歿,书也就很自然地传给己子,而其子不能守,遂使祖父倾毕生心血购置的万卷缥緗易姓别归。”^②此论可谓正误各半。张佩纶光绪十六年闰二月初二日日记称,朱潛由京来津,将赴金陵。初三日载:“答子涵。结一庐藏书均在子清处,恐遂散佚,商令子涵携归,恐不能办也。为之怅然。”听闻结一庐藏书兜售的消息,收藏家唯恐落人之后,尤其是江南的诂宋楼主人陆心源。光绪五年张佩纶连遭数劫,四月母丧,五月初五日妻亡,七月小女夭折,不得已将两个儿子寄养舅家。^③具体情况是,结一庐藏书并没有立即出售。光绪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日记曰:“子涵自江宁归,留之午饭。子清七子家事,颇费斟酌也。”同年十一月初五日载:“子涵书来,子清之子同官死军械所……后闻浙书,同官未死,盖子清之妾毛氏伪造一电给子涵也。子清有此悍妾,貽累无穷。辛卯七月补记。”据此推测,大概朱澂子多妾悍,家事纷杂,一时难以理清,所以藏书兜售一事便搁浅下来。张佩纶估计平时与朱澂之子走动不多,而与朱潛往来较为密切。这也给了张佩纶、朱潛充裕的时间来处置此事。翻检张氏日记,光绪十六年四月十三日:“子涵寄伊墨卿画、钱竹汀隶书联并扇、镜等件。”十八年(1892)五月二十九日载:“子涵寄聚珍板八十余种来。”有张佩纶给朱潛的书信为证:“续示聚珍书目单(来单不欲遗失,已装之夹),共有初装陈式本四五十种,次者四五十种可以让兄,藉此兄得有结一庐藏书,摩挲珍护,何幸如之。”^④缪荃孙《艺风堂杂钞》辑有《张幼樵与朱子涵书》,张佩纶《涧于集·书牋》未收录此文。信中称“谈及同官,不胜愤闷”,听孙宝琦说,同官欲兜售藏书,但一时不得售主,陆心源出价仅万元,同官不肯售而止。张佩纶在信中申明五种益处,为了不落入他人之手,嘱咐朱潛“劝

①叶昌炽著,王欣夫补正: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9年,第691页。

②李雄飞:《缥緗盈栋,精本充牣——仁和朱氏结一庐藏书研究》,《文献》2001年第4期,第270页。

③张佩纶著,谢海林整理:《张佩纶日记》,第17页。

④陈秉仁整理:《张佩纶致朱潛书札》,见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:《历史文献》第十三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163页。

责兼施”，佩纶以陆氏所开之价购入，如嫌价少，可剔出朱澂新增之书，并答应代撰藏书目录，有助自己著述，还可原价取还，防止朱同官浪用，免得朱潛受牵连。最后说：“能取到书目寄来，即可定义。今年定义，明年取书，似可。”^①果然，十九年（1893）九月初六：“李怡庭、杜心垣自杭州来……《结一庐书目》四本并至。”当时朱子涵改官江南，所以委派书估李、杜十月初九再次前往商洽。张佩纶给朱潛回信说：“书目居然寄到四本，以仁义礼智分编，每编四十餘箱，共一百六十三箱（仁字阙廿七至四十五十八箱，义字亦阙四箱），信字一本。”^②可知当时先获得结一庐藏书目录，大致按排架来著录，便于取放，并详细地记录了箱数。十月二十日载：“午后，李怡庭及王福取书回。共一百八十五箱，书百八十二箱，三箱杂帖，无佳者。”另有张佩纶致朱潛书札为凭：“李和顺及兄所派两仆于前月廿日回津，书二百箱除式如酌留洋板及楠木装潢之陈式各种，实来一百八十二箱，附以帖三箱。”^③简言之，直到光绪十八九年，结一庐藏书才经朱潛之手转给张佩纶，而且是分时段的，并不是一次性转让。至于李雄飞文中称：“在这次争购结一庐藏书的过程中，时官居金陵的张佩纶近水楼台先得月。”^④此误。结一庐散书时，张佩纶寄居在天津李鸿章府中，而非为官金陵。

朱澂病亡后，结一庐藏书流落到哪些人手里？叶昌炽称尽归张佩纶，事实并非如此。董理过结一庐藏书的缪荃孙也说：“子清即归道山，书亦尽归张幼樵前辈。”^⑤这大概是未见到张佩纶藏书目录，听信传言的一面之辞。比勘两家书目后，缪曰：“子清歿后，其家贱售之张幼樵前辈，价未清，书亦未全交。近得幼樵书目核之，朱有而张无者，或在子涵处，或系未交书，张有而朱无者，则子清在江南所得者。”^⑥缪氏在《朱修伯大理结一庐文集序》中坐实了这个判断：“子清又歿，书籍亦散，其精华悉归张幼樵前辈，其奇零有归荃孙者。”^⑦李雄飞在考察结一庐藏书流散时说：“结一庐藏书之精华为张佩纶所得，少部分为缪氏所得，澂子及澂弟潛手中均有剩餘，还有一些不知流归何处。盛极一时的‘结一之藏’，就此烟消云散了。缪氏乃朱氏兄弟挚友，曾先后与二人订交，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。”^⑧王天然撰文也同意此说^⑨。缪荃孙

①缪荃孙辑，杨璐整理：《艺风堂杂钞》卷五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253页。

②陈秉仁整理：《张佩纶致朱潛书札》，第166页。

③陈秉仁整理：《张佩纶致朱潛书札》，第170页。

④李雄飞：《缥緗盈栋，精本充牣——仁和朱氏结一庐藏书研究》，第270页。

⑤叶昌炽著，王欣夫补正：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，第692页。

⑥叶昌炽著，王欣夫补正：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，第692—693页。

⑦缪荃孙：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574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29页。

⑧李雄飞：《缥緗盈栋，精本充牣——仁和朱氏结一庐藏书研究》，第271页。

⑨王天然：《读木犀轩旧藏〈结一庐书目〉小识》，《文献》2012年第2期，第85页。

在这句话之后接着说：“子涵亦由直隶改官江南，一日持汲古钞本《金石录》，张燕公、刘宾客、司空表圣三唐人文集明钞本，中多夹签，皆先生手校欲梓者，经理刻成，以继先志。”^①这足以说明结一庐藏书还未流散之时，朱潛手中是有部分藏书的。再举日记中的一个例证。早在光绪十一年四月，张佩纶因马尾战败被遣戍塞外，此月三十日朱潛便赠书两种：“赠余《柳河东集》，附《龙城录》，明郭氏刻精本也。”而缪氏提及的这四种，即《结一庐朱氏剩余丛书》四种。李雄飞说，单从书名来看，可知结一庐藏书并未尽归张佩纶^②。缪文中也说，经其假借别本补足传之。据陈谊考证，此四种即缪荃孙代朱潛编校，在1912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经书商钱长美之手，由朱潛之子士林售与嘉业堂主人刘承幹^③。此亦可为结一庐藏书并非尽归张佩纶的有力旁证。还可据日记再举一个内证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四月十六日：“邵班卿来，云丁氏承抄文澜阁书，欲向余所藏借抄廿四种。考所藏初无此书，殆传伪也。”次日，张佩纶收到柳商贤的来信，也是替杭州八千卷楼主人丁丙来向张借书。张佩纶叹曰：“盖朱氏藏书名海内，惜已有散佚，不知羽化属何人矣。”可知结一庐藏书已有部分散落于天壤。而据张佩纶给朱潛的信札所载，除获得185箱结一庐藏书之外，尚有26箱未能收入囊中，极有可能是朱同官私下留存，而这26箱藏书却是结一庐藏书的精华^④。

缪荃孙说：“子清歿后，其家贱售之张幼樵前辈，价未清，书亦未全交。”^⑤缪氏与朱家、张佩纶都有交往，是否存在贱售的情况，张佩纶到底花了多少两银子收购结一庐藏书？邓之诚说：“润于以万金得其妻父朱学勤藏书一百八十二箱。”^⑥《张佩纶日记》中出现与购书有关的“万金”一词，仅见于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：“侯念椿寄来蒋氏《书目》，美不胜收，索价万金。”二十一日曰：“料理蒋氏书，力不能致，思择一二以自娱。”据《张佩纶日记》所载，光绪十九年三月十三日书估李怡亭、杜心垣南下，又委托搜罗蒋氏书。此处所指蒋氏书，是苏州蒋凤藻藏书。据缪荃孙《艺风堂杂钞》所载《张幼樵与朱子涵书》曰：“索万金，除重复及让价外，可以得之。”^⑦实际上讨价还价后，蒋氏书止三四千金。“今年苏州有书出售……价止三四千金（索万金，除重复及让价外可以得之）。如同官处葛藤太多，弟竟力不能了，兄无由隔海设策，或谋苏书耳。”^⑧张佩纶以苏州蒋氏书为参照，如果朱同官索价过高，还不如购买蒋氏藏书。为了不落他人之

①缪荃孙：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五，第229页。

②李雄飞：《缥緗盈栋，精本充牣——仁和朱氏结一庐藏书研究》，第271页。

③陈谊：《嘉业堂刻书研究》，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，第11页。

④陈秉仁整理：《张佩纶致朱潛书札》，第170页、173页。

⑤叶昌炽著，王欣夫补正：《藏书纪事诗附补正》，第691页。

⑥邓之诚著，邓瑞整理：《邓之诚文史札记》，第483页。

⑦缪荃孙辑，杨璐整理：《艺风堂杂钞》卷五，第253页。

⑧陈秉仁整理：《张佩纶致朱潛书札》，第164页。

手,张佩纶打算“若能以陆氏所议之值,由弟劝责兼施”^①,若嫌价少,就剔出朱澂所增的新书。就《张佩纶日记》来看,并无明确记载所购结一庐藏书的书价。经过磋商,大概以一万元成交。具体付款流程是:“同官之书已令李和顺及仆人往取,兄无一毫诈伪之念存乎此间,款钜至万余,罄奩资不足,借贷得此书。”^②据当时书价行情,缪氏称其“贱售”,大体可信。

二、《张佩纶日记》所载其他藏书来源考

据上文所引缪荃孙之说,有“张有而朱无者”。换言之,除了收购的结一庐藏书,张佩纶的藏书还有其他来源。一般来说,藏书来源有家储(祖上度藏)、购买、受赠、誊抄、交换,以及时人求序所送或代人整理的书籍。翻检日记,张佩纶藏书的来源途径主要是购买和获赠,大致情况如下:

光绪四年购买3种,借阅1种。

光绪五年受赠2种,购买3种,借阅5种。

光绪十一年受赠10种,借阅2种。

光绪十二年受赠7种。

光绪十三年受赠17种,借阅1种。

光绪十四年受赠4种。

光绪十五年受赠30+种,借阅4种。

光绪十六年受赠5种,购买38种,借阅2种。

光绪十七年受赠31种,购买71+种,借阅3种。

光绪十八年受赠105+种,购买68+种,借阅3种。

光绪十九年受赠24种,购买21+种及结一庐书帖185箱,借阅4种。

光绪二十年受赠9种,购买10种,借阅13种。^③

据此,大体上能反映出张佩纶十馀年的藏书来源和收藏情况。马尾战败,张佩纶被遣戍塞外。自光绪十一年四月至十四年四月三年间未购买1种书籍,“塞上携书甚少”,除了家中邮寄,全仰仗师友馈赠,但数量也较有限,仅受赠38种;借抄之书少得可怜,区区3种。张佩纶受赠、购买的高峰期在光绪十八、九年。此时的张佩纶乃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婿,寄寓天津李府,今非昔比。张佩纶购买书籍,一般从友人处购买或由亲属、师友代购,或是书估直接上门推销。现以此二年为例,作一简略考察。

①缪荃孙辑,杨璐整理:《艺风堂杂钞》卷五,第252页。

②陈秉仁整理:《张佩纶致朱濬书札》,第168页。

③按,有些书籍是赠送还是购买,日记所载较难甄别,但这不影响计算张佩纶购赠的藏书量。因日记并未记载购赠的具体数,比如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五宗湘文赠各家词集,十七年二月十三日与沈子梅至书肆买得丛书数种,十八年四月王懿荣寄书数种有两次,朱濬寄聚珍板八十馀种,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称连日书估集津颇有所得,诸如此类,无法精确,姑以“+”表示。另外,日记所载阅读书籍并未计算在内。

先说厂肆书估。天津是重要枢纽,不管是京城南下还是江南北上,可谓不分南北,四方辐凑于张氏寓宅兰骈馆。光绪十八年,三月初二日“厂肆书画估查至矣”,廿二日书估李怡亭寄来书两种,二十五日日记称“归来倏已半月,案头书籍纵横,今日始稍稍清理”,可见网罗之勤。他如,五月初二日三余堂送书来,廿一夜杜心垣、李怡亭两贾赴沪,又交二百金托其物色书帖,廿八日得苏州书估侯念椿书,言有宋无注本《管子》。六月初三日三余书估亦送书来,闰六月初八日侯估寄书四种。七月十八日侯念椿寄来蒋凤藻《书目》,日记称其美不胜收,但索价万金,“力不能致,思择一二以自娱”。八月二十三日永宝书估郭、刘来。十月初一日李怡庭、杜心垣自南致书帖来,初四日李、杜来议书价,拟全取之。十二月廿二日有书贾振胜入都,亲自作陪,连大年三十都有书贾持售《徐骑省集》。光绪十九年,杨估和杜心垣登门或邮寄出售书籍各3次,而书估李怡亭多达7次,深受张氏器重,俨然是张宅的座上常客。张氏数次委托他南下采书,三月十三日再次托其与杜估二人留意蒋氏藏书,并经李氏之手在十月二十日觅得结一庐书182箱,杂帖3箱。十一月初四日夜,还与之讨论求书之法。有些书估是受张佩纶亲友推荐前来的。如三月初九日欲赴朝鲜搨碑的富华阁碑贾王春山,乃王懿荣推荐。四月初五日保定奎文堂王姓书估由内所荐来。更有孜孜不倦者,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廿九日前来兜售《六书音均表》,次年十二月十五日夜又持此书前来,真可谓不分昼夜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三月二十三日载,“连日书估南来者集津,颇有所得”。还有许多抱书前来,因索价过昂而未成交的无名氏。这些足以证明了张佩纶处于天津藏书圈的中心地带,是众多厂肆书估青睐的重点对象。

次说亲属师友。比如,张佩纶钦慕苏轼,谪居塞上时,携书甚少,便写信给内弟朱潜说:“游厂肆,如有《东坡七集》,代购一部,板须好,价随意酌之,便中告知安侄(张安圃)同留意。安侄处有《三苏全集》,但板不佳耳。”^①张佩纶长子志潜说:“再同外舅、廉生祭酒皆与先公为文字交。塞上三年、津门七载,或论《管子》学,或谈碑板,鱼雁最烦。”^②翻检日记,确如志潜所言。张佩纶每段时期与某一个藏书好友联系比较密切,谈论碑板获取书籍。比如光绪十一至十六年的黄国瑾(1849-1891),字再同,黄彭年之子。父子二人皆嗜藏书,家有书楼训真书屋、咏雪楼,所藏精品颇富,仅宋本元刻便达数十种。叶昌炽乃彭年弟子,其《藏书纪事诗》卷六有著录。据日记所载^③,光是因张佩纶笺注《管子》,黄国瑾分别借寄了和刻本、明本两种,其中明本张佩纶借抄了两次,还寄过“王刻十子”、《湖海楼丛书》、《张太岳集》等。他如光绪十七年的沈能虎。沈字子梅,

①张佩纶:《涧于集·书牍》卷四《复子涵内弟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566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515页。

②张志潜:《涧于集·书牍后序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566册,第620页。

③按,因黄彭年于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四病歿鄂藩任所,次年二月廿四日黄国瑾下世,故张佩纶与黄国瑾的交往于光绪十六年戛然而止。

曾从李鸿章攻捻军,官直隶通永道,后任招商局总办。此年的二至四月间,张佩纶3次从沈处买入《文选楼丛书》等数十种书籍。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日沈又来张宅通风报信,说常熟瞿氏藏书有出售之意。张志潜说到的廉生,即王懿荣(1845-1900)之字。王氏乃著名的藏书家、金石家、甲骨学家,博涉书史,嗜好金石,有藏书楼天壤阁等,郑伟章《文献家通考》卷二十著录。这两年当中,日记所载与时在京城之王懿荣通信和会面每年达三十次以上,揆诸时情,二人交往可谓十分频繁。除了前面提到的为张佩纶介绍书估之外,王懿荣有自己固定且熟知的书估。如张佩纶光绪十八年三月初七日记,在京途遇王氏,当晚便遣一个“颇长于目录之学”的书估杨世桢来给张送书。因张佩纶与夫人李菊耦酷爱书画碑帖,王懿荣单是这两年就为之物色了《雁塔圣教》、宋凤墅石刻楞图、隋砖等珍本精拓,之前的光绪十七年寄来了明拓唐帖《皇甫》、《雁塔》、《圭峰》、《玄秘》四本。王懿荣所藏多明南监本,尤以宋刻《汉书》最为名贵。^①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记载,张佩纶有幸在光绪七年花了百两白银购得监本《金史》、冯刻《三国志》及闻人本《旧唐书》,王懿荣认为后者足可抵得百金之价。十九年十二月廿三日张致信给王,托其代购监本《新唐书》,以补全监本廿二史。王懿荣为之代购过多种聚珍本,并赠送了家辑的《天壤阁丛书》和多种《兰亭》拓本等,还格外关心张佩纶所收的朱氏之书。张于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收到王氏书信,“言朱处之书以《周礼》、《晋书》及《两汉会要》为最,蔡梦弼《史记》次之,其难得在唐宋元明钞本各集”。除了代购或赠送,张佩纶的好友也会为之引荐,如光绪十八年六月十七日洪翰香携其族人书籍数种来售。

概之,除了获得结一庐藏书精华之外,张佩纶的藏书一部分乃自己购买、誊抄,一部分由亲友赠送。

三、从日记看张佩纶藏书的规模及其特色

据张佩纶日记所载,光绪十七年二月廿五日日记说:“斋中书籍纵横,廿二日尽去客次床几,以书笥十列于东壁,增书至二千卷。”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称“去年储书渐富”,同年十二月三十日日记号称“得书数万卷,书高于屋”。由上可知,不计算所收的结一庐185箱书帖在内,张佩纶受赠或购买的书籍约计460种以上,借抄38种,若加上平时的阅读量200余种,按最保守的估计,总量超过700种。张佩纶的藏书总量绝对令人叹为观止。同时期的钱塘丁丙、丁申兄弟建八千卷楼,尚不过万。上文已引,丁氏曾托人数次向张佩纶借书抄录。张佩纶号称“数万卷”,绝非夸张。据《大清畿辅先哲传》卷二十六所载,张佩纶仿照《四库全书》体例,编有藏书目录《管斋书目》。今有日记为证,光绪十九年三月十八日载,张佩纶藏有《曹子建集》,认为以无《七步诗》者为佳

^①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(清一现代)》,中华书局,1999年,第1151页。

本,但曹子建实有《七步诗》,故作了一通考证,说:“偶因《曹集》略及一二,其详具余书目附注中。”可知张佩纶在搜罗书籍时,已着手编撰书目。后又有《丰润张氏书目》,今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,系徐氏积学斋蓝格抄本,依箱著录,不分类。郑伟章称此目著录约600种,皆为抄本。又据今藏南京图书馆《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》所引张佩纶之子张志潜的话说,1911年也就是离张佩纶去世尚不足十年,其藏书有五百余箱之多,但因辛亥国变遂被宋教仁攫去,宋卒后,藏书遂散,1916年于右任出面,仅追回120余箱^①。据此可知张佩纶藏书最高峰时有500余箱,远远超过所收的结一庐藏书185箱。至于《丰润张氏书目》所著录的600种抄本,只是劫余后的藏书量,而张佩纶苦心搜罗的稀见刻本必定不在此数之内。一言以蔽之,张佩纶的藏书规模不可不谓宏富,说他能跻身于晚清藏书大家之列,当无异议。

前文已提及王懿荣告知张佩纶,朱氏结一庐藏书最难得的在于集部唐宋元明钞本。其实在购得朱氏藏书之前,张佩纶早已留心搜集抄本。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六日记载:“十年购书,间有精抄本,然心绪烦劣,不能审阅也。晴窗偶检《邓巴西集》,阅之,系抄本,经校者从《元文类》补文五篇。《石渠宝笈》补《郑金事平安书》二通,乃从鲍氏通介叟家藏本过出,亦善本也。又得《居竹轩》及《蒲顺斋闲居丛稿》,亦抄本。然余所以爱者,则以黄尧圃所得旧抄《管子》、顾千里所得旧抄《韩子》两种为最。两本,《管》已为金陵局所刊,《韩》则吴山尊刊之,然局刊《管》本少一页。抄本诚可宝矣。”张佩纶搜罗书籍多年,至此已收得精抄本多种。认为“抄本可宝”,这在佞宋成风的清代实属难能可贵。降至清末,即便是精抄本也难得一觅。张佩纶光绪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日记曰:“阅许白云、张光弼、陈夷白三集,皆金氏文瑞楼精抄本,后归法梧门,展转入结一庐。梧门不以藏书名,而所收甚富,盖其时旧本易得,不如今日之难能可贵,且见老辈无不储书,决不如今之名士手一二唐宋人集,便胆大以粗睥睨一切也。”换言之,当下名士捉笔抄写唐宋人集也是较为名贵的,故有王懿荣之说。但是,我们也别以为张佩纶唯抄本是瞻。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六日载,张佩纶已收有宋人周密所著《志雅堂杂抄》刻本、抄本各一种,翻阅之后,认为此书“殊琐碎无足取”,“极浅陋,无异兔园册子,其人特今之骨董家而已,士大夫得一精抄以为秘本,甚无谓也”。也就是说,张佩纶认定抄本的标准是从学术价值上而言的,并非单从抄工等外在形式上着眼。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二日称,读书当求诸善本。十七年六月十八日载,因见方志陈旧,体例浅率,考证疏陋,也是想觅得善本以资披览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则,张佩纶才对清中期著名的黄氏校抄本、顾氏校抄本珍若拱璧。据日记所载,张佩纶所珍爱的黄抄本于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觅得。此本是乃黄丕烈旧藏影宋《管子》抄本,且十三卷以下由黄氏精抄补全。细检日记,诚如张佩纶所说,在购得结一庐藏书之前,十年间有精

^①郑伟章:《文献家通考(清—现代)》,第1168—1169页。

抄本,数量并不多,除了上引的名家精抄本之外,还收藏了宋穆修《伯长集》抄本、清杭世骏《续礼记集说》抄本。光绪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日记曰:“九弟寄《宋三贤集》,柳河东、穆参军、尹河南。余在都正得穆集抄本,见此可发一笑,物罕见珍,此之谓矣。”

张佩纶藏书不仅对名家抄本视若珍宝,还对一些雕刻精良的善本青眼有加。即以穆修集为例,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:“穆修《伯长集》,代州冯秋水方伯如景顺治中刻之金陵……据此则穆集已有冯刻,然《四库》所收乃钞本,粤刻《三宋人集》亦据丁雨生所藏抄本,盖冯刻已如星凤矣。”他如,光绪十九年正月初七日读宋刘敞《公是先生弟子记》,盖此本为四库所收的浙江巡抚采进本,《四库提要》称此本乃宋淳熙赵不黯校本,证以《永乐大典》所引,也可谓“罕觐之笈”,所以张佩纶也说“传刻者犹善本也”。仅以日记所载为限,张佩纶藏有以下旧槧精刻:

1. 宋本或影宋本5种: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四日莫友芝翻刻宋本《陶渊明集》。六月廿七日宋本《管子》。光绪十八年十月十二日宋本《祖龙学集》。光绪十九年十月廿二日明项墨林、季振宜藏宋本《陆士龙集》。十一月廿四日宋本《广韵》。

2. 元本7种: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草堂麻沙本《杜诗》。光绪十七年八月初七日元《纂图互注荀子》《扬子》《文中子》三种。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元本《千家注杜》。光绪二十年二月廿六日元本《文粹》及刘须溪评点《王荆文公集》。

3. 明本8种:光绪十五年正月廿六日汲古阁本《元遗山集》。光绪十七年七月廿二日汲古阁本《说文》。十一月三十日汲古阁本《韦苏州诗》。光绪十八年十月初一日明初刻足本《贝清江集》,初八日明嘉靖本《周礼》。光绪十九年二月廿六日明刻钱谦益《初学集》。光绪二十年正月廿一日明弘治吕夔刻本《王右丞集》。四月十四日明刻《王忠文集》。

4. 清本16种:光绪十七年九月初十日缪荃孙刻本五种,“纸板甚精”。十三日雍正云间赵骏烈刊本《后山集》。十二月十五日《带经堂全集》,“纸板初刻精雅”。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日顺治冯刻本《伯长集》、浙江翻聚珍本《文恭集》。廿一日聚珍本《西台集》。四月十三日雁湖《荆公诗注》、《陆宣公奏议》一部,“皆精本也”。十一月十五日陈思庐刻本《吕东莱集》,“亦佳”。光绪二十年正月十一日《永乐大典》辑本《王魏公集》。十六日武英殿聚珍本《刘忠肃集》。二月十九日武英殿重编本《攻媿集》,“诚为旧帙孤本”。

邓之诚在1949年9月21日日记中说:“阅《润于日记》毕,亦有一二轶事可采。润于以万金得其妻父朱学勤藏书一百八十二箱(艺风云:款未交足,书未全交),集部钞本最多,宋本以《周礼》《晋书》《两汉会要》为甲观。”^①因日记并

^①邓之诚著,邓瑞整理:《邓之诚文史札记》,第483页。

未记载这3种宋本的来源,盖乃结一庐藏书流出之物,故上述名单中未予胪列。而邓氏所言“集部钞本最多”,也是就此而言的。实际上从四部分类来看,在收购结一庐藏书之前,张佩纶日记中所载集部书并不多。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日记称“篋中集部最少”,当是实话。书家向来会凭着自己的喜好来藏书,张佩纶也如此。因为不喜欢清初王士禛,张佩纶在日记中三番五次对其口诛笔伐,这自然影响到他的收藏门类。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日曰:“又得《池北偶谈》一种。余向不喜渔洋,故此类全未收取也。今乃无意遇之。津门书少,收例稍宽。”只不过是碍于此时藏书较少,故而不得不放宽范围。

四、娱情与治学:张佩纶藏书的两大目的

张佩纶搜集图书碑帖的主要目的,其一是娱情。读书能消遣时光,娱悦身心。如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记曰,向顾肇熙借《南宋杂事诗》,“阅注中琐闻,碎录以资消遣”。而谪戍塞外的日子更加寂寞孤独,正如张佩纶给张曾颺写信所说:“初到戍所,不能无迁谪之感、离索之怀。日来闭户读书,渐忘之耳。”^①打发时光的一大方式便是读书。光绪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日曰:“连日体颇不适,间阅朱子集,以养心节虑。”十月初十日读《庄子》遣闷。更多的是读苏轼诗来解闷。张佩纶作诗曰:“谪居问何学,所愿则东坡。”^②入塞三年,四次谋居,或以苏轼诗命名,或自比苏轼来解嘲。而寄寓李鸿章译署的日子也并不十分如意。光绪十七年五月初十日晚与李鸿章讨论洋布机器局事,因意见不合,张佩纶说:“余已废弃,分当不交人事,而贫困无归,遇事又不能默默,非吏非隐,殊自愧也。”光绪二十年(1894),日本出兵朝鲜。五月二十六日日记说:“余废人也,谋未必合时,殊为愤闷,姑无言预坐而已。”七月初五日又说:“余执不在其位之例,不听即已,亦不力争也。”张佩纶的尴尬身份与秉性议事,结果导致被逐出译署。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载,乘舟漫游之际,也是携杜甫、苏轼、王安石、朱彝尊及李商隐五家诗集以解寂寞。除了消磨时间,张佩纶是真心爱书之人。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日记说他嗜好本朝黄仲则诗,十八岁时从宗载之处借抄全集,27年之后才买得《两当轩诗集》,“披阅一过,如遇故人”。书籍不仅使张佩纶如遇故友,欣喜若狂。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,因为没有翻检到宋本《祖龙学集》,为之郁闷数日。而光绪十九年三月初七日,案上的元瓷水盂被新来的小僮误碎,张佩纶说:“余从不以误碎物呵斥僮仆,惟书则禁止涂抹耳。”心疼的是书!张佩纶喜好收藏书帖,还有一个“同谋”李菊耦。如《兰亭序》拓本便有定武肥本、神龙本、定武瘦本3种,《圣教序》《雁塔》也有精拓旧本好几种。光绪十九年四月初七日,书估送来《珊瑚帖》《复官帖》,索价千金,因无力购买,李菊耦“暇中双钩之,惟妙惟肖,亦闲中一乐也”。诚如张佩纶光绪

①张佩纶:《涧于集·书牍》卷四《致张晓帆太守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566册,第505页。

②张佩纶:《涧于集·诗集》卷三《北海轩十首》其七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566册,第107页。

十七年三月初七日所言：“余校《管》馀暇，颇以书画为怡性遣闷之具，较量吏隐闲者之福多矣。”

其二是治学。张佩纶光绪十八年四月十一日日记曰：“藏书不多，何能轻言著述哉！”所以为了治学，需拥有大量的藏书。张佩纶一生当中最主要的学术活动就是笺注《管子》。为了注《管》，可谓孜孜不倦，不遗余力。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六日日记曰：“修理《管》注，苦无养性之乐，至是始定日注《管》而夜读书，或诗或文，不事考证，以畅其趣。”张佩纶是一边注《管》，一边读书，穷索冥搜四部中对《管子》及管子本人评点、议论的文字。比如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向朱潘借俞荫甫《诸子平议》之《管子》六卷，阅《周礼注疏》以证《管子》。光绪十七年四月从《玉海》《东都事略传》稽考出丁公雅有《管子要略》五篇。光绪十八年九月以《艺文类聚》大字本、《长短经》校引《管子》数十条。光绪十九年，二月读《唐书》摘录所引《管子》一条，收入逸文当中；又杂阅宋人集中题跋来考《管子》，仅取韩元吉《读管子》入抄；六月摘录朱武曹校诸子之《管》数十条。有趣味的是，张佩纶于诗人当中最敬仰苏轼，光绪十七年十月初六日读其《琴诗》时，以《管子》注苏诗，自鸣得意地说：“是能读《管子》者，莫如东坡矣。余数年来作《管》注、读坡诗，为两家结一重缘，亦熟能生巧欤。”当然，最有效的无疑是获取各种版本的《管子》及相关著述。细核日记，大致如下：（一）光绪十一年4种：十月初二日十子本、江宁局本，十月廿六日方望溪删定本，士礼居宋本。（二）光绪十三年7种：正月初六日明朱长春《管子榷》、明梅士享《论叙管子成书》，均为内府藏本。三月初一日章洪钧寄崇文书局《百子》本。五月二十一日黄国瑾寄日本刻《管子》。六月初六日尹注《管子》。八月初五日《管子义证》，戴子高校《管子》。（三）光绪十五年3种：正月初四日向于式枚借吴勉学《管子》本。七月初五日向胡云楣借王南陔《管子·地负篇考证》，二十八日黄国瑾寄明十行无注本《管子》。（四）光绪十六年1种：六月二十七日常熟瞿氏校本。（五）光绪十八年3种：四月二十九日何如璋注本。闰六月初五日书估侯念椿寄莫友芝藏明本。十月初一日黄丕烈藏影宋补抄本。另外，光绪十二年二月初五日载，谪友龙继栋许借《管晏合编》刻本，但始终未借。概之，张佩纶购买、借抄的《管子》多达18种，其中黄国瑾所藏的明十行无注本在光绪十六年四月又借抄了1次。单论注《管》所引版本，张佩纶也可傲视群雄了。

结论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对张佩纶藏书得出如下结论：

一、仁和朱氏结一庐藏书的精华归于张佩纶。张佩纶通过结一庐主人朱学勤次子朱潘的介绍，于光绪十九年十月请书估李怡亭、杜心垣运作，在十月二十日午后由李怡庭及家仆王福从杭州取回至天津寓所，共计185箱，其中书182箱，杂帖3箱。《张佩纶日记》并无明载所耗资金，但据信札来看，大概是参

照陆心源所开的万元之价购入的。在此之前的光绪十一年四月,朱潘曾赠书给滴戍塞外的张佩纶。结一庐剩馀藏书一部分由朱同官留存,一部分归于朱潘,后来其子朱士林出售四种给湖州嘉业堂。

二、除了所购结一庐的185箱书帖,张佩纶藏书的主要来源途径是受赠、购买及借抄。张佩纶藏书有十数年之久,光绪十七年仅有二千卷,到了光绪十八九年藏量激增,到光绪二十一年藏书总量大概超过700种,加上所购的结一庐藏书185箱,有数万卷之巨,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藏书规模达到顶峰,高达5百多箱。藏书期间,张佩纶已着手编撰藏书目录。而《丰润张氏书目》乃国变劫馀后追回的120馀箱之存目,约600种,皆为抄本。张佩纶所收结一庐藏书之精华是《周礼》、《晋书》、《两汉会要》、蔡梦弼《史记》以及唐宋元明集部抄本。此外还藏有一些精刻精抄的宋元明清善本。张佩纶藏书的主要目的是娱情和治学。

【作者简介】谢海林,男,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:清代文学与文献。

·书讯·

中国古籍珍本丛刊·武汉大学图书馆卷(全七十二册)

精装16开 定价:48000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年11月出版

本书收录了武汉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古籍二十种,均为首次揭示。其内容分为四个部分:一经部文献,包括《易经正讹》等3种文献;二史部文献,包括《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》《筹海图编》等8种文献;三子部文献,包括《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》等4种文献;四集部文献,包括《陈伯玉文集》《文山先生文集》等5种文献,这些著述均具有较高的文献参考价值。其中有不少是只有武汉大学图书馆一家收藏的名家批校本文献,如清代藏书家、书法家何绍基批点的《汉书》《后汉书》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》;清代戈襄批校本《墨子》;清人郭嵩焘校本《施注苏诗》。